

持正欧楷毕生求

——怀蕴章先生

姜维群



互联网时代信息发达,中午田蕴章先生病逝,下午即看到消息。先为之一惊,随后忽然心里冒出一句古语,“但恨不见替人”。

杜甫的祖父是唐代近体诗奠基者之一,病重时宋之问等人前去探望,他说,他在久压诸位,“今且死,固大慰,但恨不见替人”。说者貌似风趣,但闻者为之颤。蕴章先生走了,他空出来的书法“位子”短时间内很难有人填补上来。不是吗?

上世纪90年代,全国欧楷之兴始于田氏兄弟。特别是田蕴章,担纲书法正书一派,肩负欧楷传承之责,践与行也好,鼓与呼也罢,几十年似一勇士,以一己之力,站在欧阳询楷书山头上,“任尔东西南北风”“我自岿然不动”。

和书法家接触多了会发现,有的人名气大了,出来进去前呼后拥了,不由他不飘飘然。当被称为“中国欧楷第一人”时,田蕴章淡淡苦笑道:“我充其量在欧楷这山上才走到半山腰,而那些大呼小叫的人都在山脚下,刚进山。”

田蕴章出身名门,但又是苦孩子,年仅11岁即辍学,小学未毕业就进入文艺界工作,用他自己的话说“被迫读了一点书”。我与他初识是在河西区电灯房胡同,昏暗的路灯下谈天说地,谈到他为养家糊口曾评过书,评书滔滔不绝讲上十天半月当然有“弹尽粮绝”的时候,怎么办?他说随手抓,到处“借”呗。一次

他讲到最后要留扣子时,忽然没词儿了,这是吸引听客明天来继续听的关键之处,糊弄不得,这个情节或人物或兵器必有夺人之处方可,正在搜索枯肠脑筋飞转之时,剧院的棉门帘一掀,烧锅炉的拿着铲煤的铁锹,拄在胸前来听书。他心里立刻演化出来一个持全新兵器的人物——飞铲大将军。话头一转,他说,临帖写字何尝不是如此,要有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的眼界,这样才能峰回路转、柳暗花明的心境。

当代书法家大多书写的作品多,撰写的文字少。书法家不写文章没有著述,或因忙而无暇顾及。不可否认,腕下有诸多墨汁写作品,腹内却没多少墨水做文章的也大有人在。

田蕴章则不然,他将欧楷写到了极致,又将欧楷唐楷研究到了顶点。常常是,木秀于林,人高于众,就有了谤点,自带了瑕疵。我曾当面讲过,面对这些,你的傲气不是居高临下,你的和气常咄咄逼人。他笑了。

以近现代欧楷论,清末书法家黄自元,不仅写欧在当朝为欧楷第一,还被光绪皇帝召进宫中书写碑文,被誉为字圣,并著有《楷书结构九十二法》;还有王澐,清代中期书法家,其临写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传世于后,亦为欧楷一家。就研究欧阳询及欧字来说,田蕴章与王澐、黄自元可有一比,翁方纲曾这般评价王澐:“篆书得古法,行书次之,正书又次之。”王澐之欧楷略有变形,笔力之骨力失劲;而黄自元

欧楷虽在民国时盛行一段时间,初学者尚可,学者则则奔之。

田蕴章避开欧楷承袭之前弊端,明确提出来,不要写我田蕴章,更不要学什么“田楷”,为此曾进行过一次郑重其事的讨论。

特殊年代家被抄,劫后竟然留下一本《九成宫醴泉铭》字帖,我不记得那时,全家被赶到农村依然在临它。后来才知道是黄自元的临本,感觉心里不大自在。但毕竟近十年打造了书法基本功,具备了欧楷的模样,就像吃反季节菜,并无什么伤害,在“青黄不接”之时它能解渴果腹呀。

最后田蕴章也点头了,他说“田楷”可以作为入门,作为入欧楷堂奥的台阶未尝不可。倘若门敲开了,这个敲门砖一定得扔掉。其雅量,其肚量,其见识,我真的佩服。

他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任教,在课堂上说得最多的不是技法,而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两个字:读书。他精辟地总结出,书法是东方美学的核心,同时又是西方美学的盲点,切不可用中国书法之足适西方美学之履。对书法所谓创新之说尤其反对,且旗帜鲜明。

田蕴章作为书法家、大学名校教授,其言辞犀利的反诘就像投掷的球,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就越强,没经“选举”即成为风口浪尖的论坛保守派代表。

说真的,他没有气急败坏,而是温文尔雅,还是娓娓道来,还是侃侃而谈,在天津电视台录制播放的80集书法讲座中,他不回避不躲闪,就像拳击手上擂台,直拳勾拳连连还击。

梁实秋先生有一篇悼念胡适先生的文章,题目是《不要被牵着鼻子走》,文章少有高调的口号、空洞的定义,罗列的或大或小的事情中贯穿着这一主旨。田蕴章书法在书体上是被欧阳询“牵着鼻子走”的,他坚持学古人要亦步亦趋,要广大精微。在书法观点上却是特立独行,皓首不改其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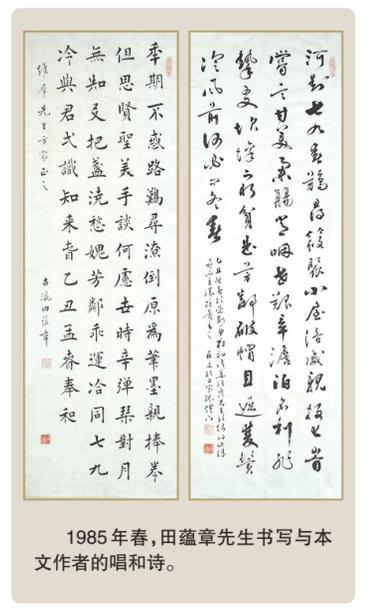
有这般见识,这般的骨气者,当今鲜矣。读书著书是他晚年的不离不弃,让人学欧莫学田是他内心的呼号,为此他出版的《九成宫醴泉铭探源》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定稿,《欧楷解

析》顾虑到自己写的范字,会让读者忽略欧阳询字迹的权威作用,竟将他已写好的几百个范字全部废弃,重新换作欧阳询字迹。此书其实是部微型“书法全书”,可以细细品读的大书,可直入作者胸臆,而一窥弘扬书道的拳拳孜孜。

后人评陶渊明确这样说:“若以法眼观,无俗不真;若以世眼观,无真不俗。”田蕴章之书法、书论或可经得起这样的评判。

用真学问大境界,可以把一件事做到无人企及的高度,无论法眼观、世眼观都达到无俗不真、无真不俗的人生高光亮点。

先生在癸卯腊月的双立春日魂归道山。腊月立春是春天吗?在一个没有春意的凛凛冬日,春真真切切地在眼前。矛盾这个东西,无时无处不存在,时时处处在纠结。不敢为之盖棺定论,但田蕴章先生持正欧楷毕生求的精神可嘉可怀,“但恨不见替人”亦堪忧堪虑也。



读“生命之书”

[加]曾晓文



称资深暖男。他十分敬业,因日程紧张,仅留半天休闲时间,错过不少人向往的文化考察,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在后面的十年中,我去过暨南大学五六次,参会,与教师、学生交流,几乎每次都能见到蒋先生,得以延续文学上的缘分。他关注海外华文文学,还身体力行,2018年主编了“七色光丛书”,由花城出版社推出,收入海外8位作家的散文集,我的《属树叶的女子》荣幸在列。我在圣诞节前夕破例远行,去广州参加新书发布会。蒋先生对丛书编选意义的表述,即是一篇优美的散文,他说,海外作家的“作品犹如一面镜子,直射、折射或者反射着异域的种种风情,他们的心也似一束束充满能量的光透视着这个丰富而复杂的世界。正如批评家艾布拉姆斯将欧洲文学理论的发展梳理为‘镜与灯’两个喻象,世界现实的复杂多变经过作家心灵之光的过滤与映射,呈现出斑斓陆离的光彩——‘赤橙黄绿青蓝紫’,令人心荡神移,迷醉沉浸,故丛书冠名为‘七色光’。”

再回想2023年的会场,蒋先生感谢主办方、学者、志愿者,还感谢远道而来的海外作家,并强调道,“你们是我们这些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的‘衣食父母’!”我深受感动,全然忘记自己的“高龄”,像追星生般大声叫好。不记得从前是否听人这样说过,至少在最近几年没听过。海外作家在国内发表,出版的园地甚小,学界关注甚少,蒋先生懂得这一群体的困惑,真诚表达心声。

会后我有幸获赠他的新作,才知他从暨大行政一把手的位置荣休后,在文学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精力,出版了评论集《典范与重构——当代文学经典与话语探析》,还跨越边界,从编选散文自然过渡到创作散文,并结集为《生命是一部书》。封面朴素的大地般的底色,凸显灵动的流水般的“生”字,正符合他的风格。腰封上写着:“以‘言、行、事’写人生,与崇高的精神对话,与真挚的生命交流”,也是他为文为人的坦诚自白。在标题散文中,他写道:“大千世界,众生皆有自己的一本生命之书,各具情节,各有风姿,才有这世界的丰富多彩。”

那晚,他热情邀请海内外大约十位文学知己,在一家书墨飘香俱乐部雅集。他兴致勃勃,为席间的几位海外文友题字,问我中意何词何语。我常住小镇,一些邻居的房屋早被冠名,比如“蝴蝶蝶沙滩”“湖景阁”之类,我入乡随俗,称自家“文涯居”,不过有名无实。蒋先生会意,在长条桌上铺开宣纸,挥毫写下“文”字,自觉力度不够,丢弃重来。当他酣畅淋漓地完成,还饱蘸期待,即兴题词:“人生有境界,创作无止境。”“文涯居”霎时变得形神兼具,寓意深远。那真是一个奇妙的瞬间。

洋贰万壹仟元,连同息单于本年三月份一并捐助南开学校,即清查照过片,以便该校收执为荷。”严修也曾约请范竹斋等人商讨券募集资增设南开小学事项。家乡年景欠佳时,范竹斋也几次放假,1919年,他调动马车向范家庄、刘安庄运送红粮(高粱)一百石,“不分姓名,凡属贫困户,大口小口,每人三斗”,同时还给孤寡贫困户发放了棉衣等物品。1938年,他通过大乡联保主任、村公所放粮,宣称“救灾济贫,不分老幼,一口一斗”,救济乡民度过时艰。1930年,范竹斋得知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公善水局(位于天津东郊范庄村)亟待重建,便慷慨资助几百大洋,重建后的公善水局青砖青瓦,宽敞大气,各类救生器具一应俱全,设有救火水机、高梯、挠钩、桅灯等,还有召唤村民参与救火所用的锣鼓、火哨、梆子等。此后,公善水局积极参与乡村救火抢险以及地方灯会、庙会等公益事业,因为当时公善水局把习武强身作为救火消防的主要基本功,还形成了当地习武健身的传统和村风。1939年后,因时局动荡,民生凋敝,公善水局也日渐衰落。

范竹斋旧居如今被打造成为了津沽旧事沉浸街区,与相邻的张学良旧居一起还原民国时期社会风貌,集中展示天津城区商业繁荣景象,通过沉浸式互动剧、曲艺、歌舞表演等,演绎津沽旧事传奇,成为名人故居与商业业态融合的典型案列,备受游客青睐。



扫描二维码,观看本期节目视频。

读读写写(九)

寻找写作时间

杨仲凯

很多人喜欢写作,也觉得自己有天赋,希望通过写作的方式来谋生、成名。但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没有时间专门写作,所以也有人就想,如果能全职写作就有时间了,可转念一想,自己写的东西连发表的机会都还没有或者很少,到哪里去挣稿费 and 版税呢?如果不是已经成名成家,稿约不断,那全职写作的事情暂且就不要想了。想写作,还是要寻求本职工作以外的时间。

其实,时间还是有的。没有寻找到写作时间,要么是统筹能力不够,要么就是还不够热爱。人的性格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慢慢形成,在学生时代,有人就是百灵鸟类型,喜欢早起读书,也有人就是夜猫子型,惯常熬夜奋战。一天的时间其实就那么多,无非是早起一些,或者晚睡一些。

早起的人创作,6点起床就够了。一定要精力集中,起来的头一件事就是坐在书桌前,开始写作,写着写着就睡意全无,写到8点,梳洗打扮出门,不耽误9点上班。如果6点起来先去洗漱,再打开音响听音乐,写日记看看手机,时间流逝很快,而且支离破碎。先把写作的事做好,很多百灵鸟型的作家在早上的时间已经能完成当天的创作任务了,两个小时写2000字没有问题,很多专职作家,一天也就是这个产量。但秘诀一

定是集中精力,除了电脑和自己,这个时间里什么都没有。

晚上可以用来创作的时间其实最长,下午5点下班的人,有的傍晚6点就可以坐在书桌前开始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,努力写到晚上11点,能有5个小时的写作时间。很多专职创作的人,也很少有这么多时间用在写作上。但晚饭就不能那么复杂了,只有吃一碗面的时间,也去不了人物和酒吧吧,如果写作乐在其中,就和自己笔下的景物一起去喝咖啡吧。一周五个工作日天天如此,可能性确实不大,但五天里如果两三天如此都做不到,那还是热爱不够。

也有人下班之后先去应酬,回到家已经晚上10点或者更晚了,除了自己,还带回来微微醉意,坐在书桌前已经筋疲力尽。这也是很多业余写作者的痛点,下班回家也许时间还有,但是体力没有了,想法也没有了。所以,要把应酬减少一些。哪怕不能晚上6点就开始,办完事晚上8点、9点开始,也总比不开始强,积少成多是一个方面,另外,不怕慢就怕站,日拱一卒,终有所成。

在奔忙的路上,也有很多时间不能白白浪费,过去在公共汽车上,有不少大姐倚在一处织毛衣,家人的毛衣,很多都是在这样的时间织出来的。写作也可以利用路上时间,如果电脑不方便,也可以用手机语音输入来完成,我就是这样做的。有段时间我坐地铁上下班,解放了双手,我就在路上写作。之前有位外卖员叫王计兵,写的诗红了,在路上就是他的工作,而他多是利用路上时间写出感人的诗。

其实还有大块时间,两天双休在一周的占比其实不小了,一年就有100多天,一年还有好几个长假,这样的整块时间,就别用来写零星文章了。如果能运用好,能写一部长篇小说。

洁上丛话

范竹斋旧居:实业家的传奇故事

王谦



范竹斋旧居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76号,建于1920年,占地面积约1800平方米,建筑面积约3500平方米,是一座极富特色的三层回廊式小楼,一、二层都有外廊,其中首层是拱券式的开敞通廊,靠赤峰道的一侧为带门洞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,大院内部另外三面都是带半地下室的二层砖木结构楼房,每座楼房前都设有台阶。二楼设有三面相通的楼道,建筑墙面开窗较多,设计细节充满着独特的欧陆美感,窗间饰以简化的西洋柱和宝瓶装饰,线条挺拔,立面丰富。院子东北角有一座圆亭式建筑,其外有8根爱奥尼柱。屋内采用花砖铺地,楼顶的平台上有一个圆形石头亭角。

范竹斋(1869—1949),名安棻,字竹斋,祖籍山东范县,先辈于明朝永乐年间迁至天津,聚居于天津市东郊区范庄子,后因谋生,范氏迁居城里,以卖糖面角为业,是老城厢一带远近闻名的“面角范”。1886年,17岁的范竹斋进入天津福成广货店当学徒,后来因采购需要被派驻上海,后任景德和棉纱庄驻上海经理。1906年,范竹斋与潘耀庭、金桂山合开瑞兴益棉纱庄,并担任经理,后转为独资经营。1913年,范竹斋与人合股经营同益兴棉纱庄,从开业到1929年的十几年间,就盈利三百万元。1919年,瑞兴益、同益兴、庆丰益、万德成、隆聚、隆顺等7家棉纱庄以及永成银号在天津挂甲寺一带联合集资创立北洋纱厂,1920年厂房建成,命名为北洋商业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,1921年正式投产。当时的北洋纱厂与其他纱厂相比较,是具有一定优势的,因为创办纱厂的股东都是经营棉布棉纱的商号,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,纱厂名称中的“第一”,包含着他们想要以此为首端,继续创办第二、第三

公司的良好愿望。但是,在当时国外资本和军阀的摧残下,民族工商业难以发展,北洋纱厂也经营困难。范竹斋任经理期间,通过合理调度棉花采购储存等手段,在一段时间内使北洋纱厂扭亏为盈,但这也无法转变困境。1930年,北洋纱厂改由以张作霖为靠山的章瑞庭独资经营,改称“北洋新记商业第一纺织公司”,范竹斋等人也就退出了股份。

1929年,范竹斋创办福安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兼经理,后应法商东方汇理银行聘请,总管华账事务。同时,还在天津法租界内梨木大街(今和平路)和法国菜市之间,出资收买大片地皮,迅速建起竹远里、大安里、大庆里等多处铺房和住房。此外,在老城厢鼓楼西大街建了铺房、住房百余间。范竹斋凭借着财力和社会声望,成了民国初年天津绸布商“新八大家”(金、潘、孙、胡、下、范、乔、纪)之一,在当时纱布业中是名声显赫的人物。

范竹斋喜爱书画,1937年,他结识了正在天津举办画展的张大千,以重金酬请张为自己作十二条山水画,用于七十寿辰时悬挂。1938年,张大千在颐和园昆明湖畔完成了巨制《十二条临古山水画》,该巨制是临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各四条,其中《临元代王蒙清湖垂纶图》题有“戊寅三月昆明湖上写拟,竹斋兄方家博教,大千张爰”等字,轰动一时,求观者络绎不绝。

范竹斋一向热心助教育才、赈济灾灾等公益事业。在南开系列学校创办的过程中,范竹斋多次慷慨捐助,如1932年2月范竹斋致金城银行的函中就写道:“贵行准字第壹号,抬头范竹斋,票面百股,计洋壹万元;准字第五百叁拾叁号,抬头范竹斋,票面百股,计洋壹万元;准字第百贰拾号,抬头范竹斋,票面拾股,计洋壹仟元;以上股票共计

现实感悟与自我成长

浅谈电影《热辣滚烫》的本土化改编

毛毛



《热辣滚烫》则更强调一份继续向前的热情,启发我们转变心态,意识到成长又何尝不是一种成功。

尽管输的结果没有改变,但《热辣滚烫》却通过对情节的改编显示着自己不同于原作内核的思考和表达。一面是遭遇失败后的悲伤呐喊,一面是直面生活后的坦然接受,一子的手被粘二重新牵住,两个失意者在夜色中互相舔舐着伤口,才知道仅是普通的生活已足够耗尽全部的力气;杜乐莹却选择在承认生活的苦痛之后,摆动着双拳,独自踏上回家的路,宣布自己“赢了一次”。或许这是属于普通人的精神胜利法,但谁又能说,站立于拳台,与生活正面搏击的勇气不值得肯定。

与此同时,值得注意的是,电影花费大量篇幅展现的身体上的转变,并未走向“丑女翻身”“屌丝逆袭”的老套戏码,而是与角色的内在精神保持一种延续。不同于原作中女主被重击后脑海中是对过去痛苦经历的回溯,《热辣滚烫》在此基础上插入了三段杜乐莹不计前嫌帮助他人的故事,在展示着那个曾经一事无成的“废柴”不为人知的善良的同时,使过去之“我”与现在之“我”在回忆中得到了联结。从寻求外界认同到回归自我认同,《热辣滚烫》中的杜乐莹最终以一个忠于自我感受、能够勇敢对他人说出“看心情”的形象出现,展现了内与外的共同成长,宣告着对自我全身心的肯定。

如何在电影改编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文化转译,平衡好市场效益与艺术价值,是改编电影成长的必经之路。虽然从更为复杂的电影艺术角度而言,《热辣滚烫》离优秀影片显然还有一段距离,但其做出的有益尝试仍然值得肯定。